

现代语境中的儒学发展

童 强

内容提要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儒学所依赖的社会生活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学出现衰落。现代儒学的重建首先依赖于理论建设。新的理论阐发可以使传统儒学摆脱旧的话语背景,进入现代语境。既针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具体问题给予创造性的理论回应,又与当代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保持着内在的呼应。儒学需要以自身独特的立场与关怀揭示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尚未揭示出来的核心文化蕴含。

关键词 儒学 儒学重建 去语境化 再语境化

童 强,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 210093

能不能融入现代语境,是儒学重建影响力的关键。早期儒学所处的是传统的共同体环境,不论乡村,还是城市,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情感、习俗、社会生活的基础,这是传统时代儒学能够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的社会基础。千百年来,基层风俗总体上是在儒学观念引导下形成的。基层风俗内在倾向性与儒学的观念相一致,构成了儒学存在的根基,即使底层民众说不出圣贤语录,但其行为却是处处体现儒家所倡导的善良、勤劳、节俭等诸多品质。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儒学的传统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风俗消失了,共同体情感以及旧有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今天奔波在城市地铁中的年轻人而言,很难讲儒家学说仍具有自然而直接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尽管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几乎从没有对儒学失去信心,社会上在局部条件下还出现国学热、读经热,但总的趋势是,儒学“失效”了。年轻人不一定会在手机上阅读《论语》,恐怕更不会去思考现代雇佣与传统忠诚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儒学需要面对现代城市的语境,面对充满现代性挑战的环境。儒学要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必须经历转换,创造性地转换到新的语境,才可能在现代社会重新扎根。

儒学的现代转换,早被学界提出来了。这是我们现代社会转型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中西方都经历过观念转型的过程,但中国现代儒学的变迁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在西方的历史上,从传统转入现代是西方社会内生性的过程,其社会思潮观念的变迁总体上也是一个内生原发事件。现代性呈现之时,西方知识界、思想界就不断地作出反应,宗教改革的兴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现代国家意识

的形成,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平等观念等等,无宁说思想变革的本身已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的观念体系在不断涌动的社会浪潮中谱写了自己的成长历史。

但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一个外部刺激下形成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现代进程难免分离为两个层面:物质、制度、体制等操作层面和观念层面。两个层面各有各的变化与轨迹,但还不是这两个层面直接互动带来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操作层面与我们固有观念层面之间更多的互动是对西方观念、西方文化的引入、融合乃至误读、曲解等等。伴随着中国物质、制度、体制等操作层面的变化,人们自然地接受了西方的某些观念。而中国传统观念、传统儒学却一时无法与我们现代社会生活诸多的变化直接联系起来。

社会生活的操作层面与观念层面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可以比做电缆的话,那么社会生活就是外层塑料,而传统观念就是塑料包裹的铜线。问题是,近现代中国的这根电缆不是空心,就是两层之间有所分离。这种分离不仅造成传统儒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降低,而且传统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动力。

我们能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可以接近或者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甚至可以在山明水秀的地方完全照搬奥地利哈施塔特小镇^[1],但是,当我们住在与奥地利一模一样的小镇上时,我们终究不可能把他们的传统当做自己的传统。我们依然缺乏文化上的归宿感,精神上的依恋。当我们穿梭在2000万人的大都市,用手机付款,闲荡在大型购物中心时,我们不知道如何接续上自己曾经拥有的传统。

一、传统儒学的社会基础

现代性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儒家观念得以扎根的社会生活形态、社会风俗基础。

传统社会主要是礼俗维系的共同体,人们交往密切,情感、价值观大多具有一致性。传统城市的街头作为公共空间,不仅聚集着各种手工作坊、市场,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中下层民众,居住的房屋狭小,邻居们的住房又彼此毗连,人们的生活簇拥在一起。许多生活内容都从严格意义上自家空间外溢到街头巷尾、路边空地、公用院落等这类公共或半公共的空间里,呈现在这种公开或半公开的空间中。正如19、20世纪之际成都城市的目击者所说:“在穷人区,人们生活在低矮的房子里,由于室内空间非常小,所以诸如吃饭、做手工、休闲等日常活动,都不得不在室外进行。虽然那些背街狭窄,却经常塞满了货摊、小贩、桌子、临时搭的棚。”^[2]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长期城市住宅建设的滞后,绝大多数民众的住房都非常紧张,居民们仍习惯在家门口的巷子、空地或者院子里吃饭,纳凉,晾晒衣服,女人们聚在一起择菜、聊天、织毛衣,洗衣服,邻里彼此交流信息、情感、观念,孩子们在弄堂里玩耍,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在这类公共空间中,人们的生活是可以看到,是可以听到的,是可以闻到的,它们构成了传统城市包括乡村相当普遍的景观。这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社会生活形态。《汉书·食货志》记载,到了冬季,农民回到城邑中居住。“妇人同巷(里中道路),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这是说,邻里女性到了夜晚都会“相从”,集中起来从事纺织工作。一晚有半天工作量,一月昼夜

[1]2011年央企中国五矿集团在广东惠州博罗县罗阳镇投资开发,以奥地利“世界文化遗产”哈施塔特小镇建筑为蓝本,建造了一个完全相同的奥地利风格的旅游度假小镇,称“五矿·哈施塔特小镇”。总投资达60亿元。请参考百度、新华网等网站报道。

[2]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就有四十五天的工作量。而劳作并不仅限于劳作本身,“相从夜绩”不仅可以节省照明燎火的费用,还能“同巧拙而合习俗”。女性干活过程中,相互学习技术,所谓“同巧拙”;相处说话交流,女性能够维持统一的习俗与观念。不难看出,传统时代,人的劳作、日常行为都倾向于统一在共同的情境中,它们的背后是共同体所维系的人们的情感、信仰以及习俗。观念的认同、接受、传播与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空间形式紧密相关。观念保持在以劳作为核心的各种日常活动中。

今天,这种共同体的背景、社会结构、行为空间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学观念存在的社会生活基础失去了。观念可以被谈论,但生活却是另一回事。现代城市已经不再是传统共同体能够继续维持的空间了。封闭的住宅单元已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彼此隔绝开来,邻里熟悉程度大大降低。人们奔波于工作地与住所之间,终日忙碌,变得冷漠。由于居住与工作地点相去较远,城市出现了地铁、轻轨、高速路、高架、隧道等各种通过技术手段提高通行能力的装置。道路不再是传统时代,人们可以随意走动、驻足聊天、摆摊设点,甚至挤占路边堆放货物的空间,而是成了技术支配的专门化、管道化的功能装置。它是机器,是大型交通设备。传统的城市道路只需满足步行、低速的马车、手推车通行即可。它有相当部分的功能实际上是生活空间的衔接与外延,特别是小街小巷。城市道路网络从最宽的主干道延伸到稍窄的大街,再从大街延伸到狭小的巷子。这些细窄的巷档弄堂成为城市循环的毛细血管,只有这些末梢能够深入城市生活的肌体之中,渗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空间当中。这一切在专业化、管道化的道路机器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道路的本质已经变化。新式的小区住宅模式彻底根除了以往的毛细血管,街道作为一种民众生活场景消失了。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消失,共同体生活的价值观也模糊了。

二、儒学的理论发展

儒学再说什么,才能够找回自己的民众,成为当下程序员、快递小哥感兴趣的价值观引导? 儒学必须创造性地理解当下这种形势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长期以来儒学的发展路径,整体上偏重还原,通过对古文献的深入解读,发现最初观念的本义。这是观念发展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不断解读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概括其中最突出的概念,如仁心、德行等,并且特别强调它们与现代社会并不冲突。我们一方面证明,儒家观念具有超越当时制度和语境的潜质,具有某种开放性;另一方面,我们相信,诸如仁心这样的儒家观念一定是普遍的基本观念。

但仅仅证明儒家观念与现代社会不相矛盾,与现代科学并不冲突是远远不够的。原始儒家思想即使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能够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接受,也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肯定仁的概念,赞同一般意义上仁心所要求的实践,但是,仁是如何具体化到现代社会的真实场景中,就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问题了,它需要儒学的理论创新。在现代激烈竞争的商务环境中,对于刚刚毕业独自滞留在陌生城市的大学生,甚至针对同性恋问题,作为传统源泉的儒家思想如何具体化地给予人们以观念支持,这是未来儒学理论发展的方向。

儒学不仅处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中,而且还处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竞争环境中。面对现代社会,它必须具有理论竞争力,具有独特的解释力和引领力量。这是传统儒学从没有遇到过的情境。儒学需要一个重新扎根——即进一步理论化的过程:通过理论化,使儒学从它固有的语境中抽离出来,这是去语境的过程;另一方面,作为理论体系的儒学再次移入新的现代语境当中,这是再语境化的过程。它必须以新的理论姿态加入到全球范围的与各种思想观念的融合、冲突和竞争当中去,获得自身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现代人需要观念支持,如果没有源于传统思想的支持,他就会用各种流行的观念,包括从自己相当碎片化的经验提炼出来的“观念”来解释自己的困惑和生活。儒家理论的传统性只是在

一定程度上赋予它被选的优先权,而这种优先权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它需要参与各种观念竞争,特别是在当今,人们可以接受来自全球的各种时尚观念,儒家观念的优先权本质上在于它源于深层次上的人性洞察与现代情境的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契合。归结起来,儒学必须意识到现在正在与谁说话。

但中国历史上,理论的发展显得尤为艰难。伯特兰·罗素1921年来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很大好感的他坦诚地说:“我必须承认,我无法欣赏孔子的优点。他的著作只着重礼仪的细微末节,他最关切的事情是教人如何在不同的场合下正确行事。……他的制度,如同他的弟子们所发挥的,是纯粹的伦理制度,而没有宗教学说。”^[1]确实,孔子的言论很少理论阐述,后来儒学的发展在理论化方面也始终存在不足。中国的文化性格并不擅长理论阐述。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中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既概括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也说出了古代理论的一般状况。先秦名家很快就衰落了,多少反映出当时的理论缺乏必要的概念框架和成长环境。伽达默尔说:“越是把理论作为纯游戏、纯直观和纯旁观,就越是应该远离作为使用、利用等严肃的事务。”^[2]理论天生需要一种避开实用的倾向,它追求理念世界的真。

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这种理论的冲动、求真的意志非常难得。西方哲学在柏拉图时代就认为存在着理念世界,它是确定的,不变的,是真实的,相反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现实世界并不真实。现实世界不能导向真理。这一观念即使不是错误的,也很难让人接受。然而这一很可能是错误的观念却对西方哲学、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理念世界既然是真实的,因此,求真必定要面向不变的理念世界,找寻其真理,而对真理的表述又必然要具有确定性的形式,体系严谨、逻辑一贯、高度概念化抽象化的表述形式,而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数学。毕达哥拉斯等对数学的研究,并非在于数学益智或者于实际事务有用,而在于数学呈现的是一个抽象完美确定的世界,它包含着哲学梦寐以求的确定性,它接近理念世界。正是这一观念促使自然科学的探索最终必然要与数学结合起来。牛顿1685年完成的巨著,书名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直接体现这一观念。成体系、概念化的表述,或者说理论形式、哲学形式成为试图揭示真理的必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希腊哲学为后来的知识探索指明了方向。

随后西方用了几个世纪探索外部世界的内在奥秘,即宇宙的秩序、事物的规律。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观念、技术、工具,包括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模式、大学机制等都做好了准备,能够揭示隐藏在事物表面下的宇宙秩序,并且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这个秩序时,西方知识体系终于迎来新的时代。现在,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获得了确定性(当然现代哲学仍然可以质疑这一点),可以运用数学公式加以描述。诸如 $E=mc^2$ 这样的表达,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科学讲的规律就不再是四季更迭那种粗略的形式,而是可以准确预测彗星出现的时间所具有的不容辩驳的力量。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知识形态。

当然,这类知识系统属于硬理论(hard-core theory),许多人文学科领域的知识大多属于软理论(soft theory)^[3]。软理论并非要得出硬理论意义上的普遍法则,但在硬理论的对照下,理论需要从具体、特定的语境中抽象出来的要求,成为普遍的自觉;只有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学说,才可能具有充分的学术高度与学术力量,也成为普遍的共识。不论是作为典范,还是作为批判反驳的对象,科学的知识系统都为古老的人文研究提供了借鉴。缺乏这一借鉴,人文领域中的哲学研究、理论研究很容易失去方向感。回顾清朝一代学术,考据之学的兴盛,与科学以及科学研究的关系并不大。林毓生说:“被胡适等人所指谓的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也只是甚为粗浅的归纳法而已,这种方法的应用与科学理

[1][英]罗素:《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3页。

[2][德]伽达默尔:《赞美理论》,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页。

[3][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论的产生,两者之间的距离是远到不相干的程度的。清代学者的考据工作与‘道问学’的传统所要解答的问题,基本上是材料的问题与原有学术传承的问题,这种问题,严格说来,不是这里所说的科学的理论问题。”^[1]在现代,科学的追求确定性的话语方式已经成为所有人文研究的基本语境,尽管人文研究有着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旨趣。

除了推动科学的出现,理论冲动的另一个结果,即形成了一套话语的实践方式。古希腊人已经意识到,求真的过程要求一种平等的对话实践,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唯一可做的是条理清晰地展开自己观点的每一步,每一步都能在概念层次上以其正确性被诚实理智的人所接受,直到大家获得一致的认识,形成共识^[2]。在这里,话语成为主宰。说服人们的不是外在权威的强制、操控,也不是欺骗、情感诱导,而是理性^[3]。当理性而不是最高权威成为话语的首要原则时,人们的共识才可能形成。求真的冲动为自身开启了一种话语语境。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经院哲学,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从现代科学到工业革命,求真的探索始终贯穿其中,它不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宗教等状况以及危机迅速作出反应,同时也在不断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准。这种理论思维、即哲学思维总是通过批判性反思为时代指明一条道路。哲学的思考虽然没有带来新知识,但它提高了人的认识境界。没有哲学,或者说理论追求,就不可能有今天所谓的西方世界。可以说,每当西方遭遇危机,哲学总是率先反思,即使在黑暗蒙昧时期,也是哲学思考最终给人们带来一线亮光。一次次的理论突破打破了束缚于欧洲传统上的桎梏,亚里士多德说,理论的兴趣使人充满生机。

当然,西方的理论探索也不断遭受冲击。在各种实用的压力下,西方思想界努力抗争,始终强调理论或者说哲学的优先地位,后来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成就也一次次证明理论的重大的前导意义。康德以理论保卫者的身份既肯定实践,又提出“理性的骄傲”,“他指的并不是科学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而是理论本身在实践内部的优先地位”。伽达默尔指出:“科学学……不是指科学理论,而只是指人类知识的哲学推导。通过这种方式,人类最关心的基本事物将得到满足。这就是近代哲学所从事的工作,即把科学重新置于古代人类知识遗产的看护女神——哲学之中。”^[4]在今天科学的技术运用渐渐控制文明进程和社会生活之时,理论自我意识仍然在发挥作用。纯理论的兴趣努力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保护自己,人们把这种纯理论的科学研究命名为“基础研究”。当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潮流很难受到限制,“理论仍须在实践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5]。

纵观西方思想史,不难看出理论探索的核心力量。相较而言,我们的思想文化史上的理论思维则受到重重阻力,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最初的理论兴趣,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庄子以及名家的讨论中、在魏晋南北朝玄学清谈中都有深刻体现。但是,理论的优先地位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国历史上尽管也认为,道理具有权威性,谁有道理,就应该服从谁。如《淮南子·主术》曰:“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豢,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抢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但更常见的状况是,如汉廷关于经学的辩论,最终的决断权都是交给了君主。传统时代的思想论辩,总体上来说,是在君主权力之下展开的,正如上引“使言之而是”中未说出的“使”的主语是君主,辩论、开口说话的权利是君主赋予的,所以思想在畅所欲言之时,也不得不留神君主的表情,思想讨论最终的结果很难完全形成具有共识的独立力量。理论话语需要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它要求敞开、开放的公共空间。这种话语实践的前提是参与

[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8页。

[2]参考〔法〕夏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理性史》,冀可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以下。

[3][4][5]〔德〕伽达默尔:《赞美理论》,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9页,第31、32页,第34页。

者具有平等地位,在这样的对话、辩论中,没有既定的权威,没有国王,也没有人可以轻易地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当然,理性的进步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它需要漫长的积累,但舍此一途,理性却是无法发展起来。辩论有可能持续极其漫长的时间,而且如何进行辩论也需要建设性的努力,但没有话语的交流、辩论,要形成真正的共识是不可能的,因此排除权威干扰,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话语领域是观念获得理性发展的关键。

由此来看,现代儒学发展首先是理论的发展。儒学必须充分意识到自身的立场,它既不是宗教的替代,也不是政治的传声,它具有自先秦时代以来就呈现出来的关怀人、关怀人本身的立场。这一立场不仅因为它在宗法时代就具有独特性,而且也会因为它在一个不断个体化、充满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重新展现出的独特姿态。对于现代而言,儒学的立场以及最初的原则仍然能够为现代儒学的发展提供基本的理论方向。这个理论的发展必须能够面对一个充满现代性的社会作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回应,而不仅仅是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

它必须能够坚持在孔孟理论的普遍性原则和立场上提出孔孟从没有提出过的理论化问题,正如明吕坤《呻吟语》所谓“言孔孟所未言,而默契孔孟所欲言之意;行孔孟所未行,而吻合孔孟必为之事”。即在理论上能够设身处地地回答孔孟从没有遭遇过的城市生产方式、城市的孤独、离异,甚至城市可能面临的恐怖袭击,从一个儒学的立场回答当代经济以及全球化的问题,等等。儒学的理论发展必须在全球诸多理论话语的竞争环境中逐步展开。

三、儒学与当代文化

儒学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延伸出去。从儒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创造性阐发出新的理论。当然,这种创新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历史的限定性,它是通过返本而开新的。二是融合进来。如果新的儒学能够融合当代文化,那么它自然就能够在当代社会环境中扎根。

所谓“融合”,主要还不是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而是与我们当代文化的衔接。这是目前儒学发展容易忽略的方面。“当代文化”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所指,它既有传统的内容,也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创造;既融合有外来的西方观念,也有我们至今没能说清楚的复杂蕴含。但基于高雅的文化姿态,人们对当下文化的浮浅、拼凑、杂乱乃至物质化的方面,时时表示出轻蔑,还有许多的批评。但不论怎么说,中国的当代社会现实总会在文化上有所反映,而文化总是曲折地映射现实并且就是现实的一部分,这种反映就是当代文化。不过,这个文化至今还没有在与儒学发展的关系以及可能的关系上得到正视。这种忽略与含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阻碍了当代文化的自觉,更重要的是,儒学尚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当代文化。儒学的扎根,就是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新儒学是我们的当代文化。

中国社会从传统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当代文化呈现某种令人难以表述的状况。一方面它是从传统那里来的。不论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又如何与传统决裂,当代文化总是带着我们无法割裂的传统因素。当然这些传统因素往往是不自觉的,如果它始终都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就很难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我们艰难地向西方学习并且有所成就。今天,中国在有目共睹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每个巨大变迁和伟大成就的背后,总是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意义。中国当代成就的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我们还缺乏深刻的阐述和准确的评价。尽管我们知道,如高铁、航天技术方面的成就,并不能直接带来文化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文化发展有其独立性、独特性,但是,社会发展的成就总是“直接证明”了它的文化优势,正如我们早年看西方,西方国力强盛,文明发达,我们直观理解就是它的文化也处于优越发达的地位。尽管这一基于情感直观的一般认知上的判断在逻辑上很难成立,但我们却喜欢用它来衡量他

者,而不是自身。中国当下的成就不得不使人提出问题:中国现实领域中的成果为什么不能用来说明我们的当代文化已经获得的丰富内涵?如此成就的背后,文化上的支持究竟是什么?传统文化上究竟是什么观念在发挥作用?

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本身就是各方面资源配置协调发展以及观念上、技术上思考、反思的结果,这必然是文化的结果。这说明当代文化可能包含着比我们想象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包含着我们今天尚未明确意识到的蕴含、尚未觉察到的东西,如性格、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化造就的。

总之,儒学的当代发展不能脱离中国的当代现实。不论儒学自身是否意识到,儒学发展的“前提”都不能不与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联系起来。对应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作为当代文化的儒学发展必须给予理论阐释。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也必然是儒学发展的最好时机。时代的成就需要儒学能从传统出发,同时又作为一种当代文化做出新的理论阐释。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常人的了解已非晚清硕儒可比。90年代以来某种程度的儒学热、国学热,折射出民众的一个基本眼光,即在世界文化的大潮流当中,把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放回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时代的巨大成就,已经使我们从“全盘西化”和“国粹保存”的那种不真实的想象中摆脱出来。在中外力量对比处于劣势时,我们不禁把这种劣势归结于文化上的缺陷以及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渴望更新,出现了全面接受西方体系的想法;又有着传统的依恋,形成保存国故国粹的强烈愿望。随后的一百多年里,这种观念、情感的强烈震荡一直持续着。这表明我们缺乏对自身传统观念体系的客观准确的评估。

改革开放的显著成就,使我们在文化评价上变得相对从容而客观。我们可以重新评价儒学,并期待传统儒学的现代重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需要与之对应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需要文化做文化自身的事情。而这个任务,不仅包括原典的重新解读,更关键地包括了儒学精神在现代语境中的扎根。儒学需要重新恢复在现时代背景下对人性的洞察,以自身独特的视角以及传统观念的资源,参与到全球文化的竞争中去。它需要吸收融合当代文化并成长成为一种现代理论,对现时代给出自己的理论回答。

〔责任编辑:肖 波〕

Confucianism Development Under Modern Language Circumstance

Tong Qiang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ccompanied by great changes of social life on which it is based, Confucianism declin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nfucianism first relies 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y which Confucianism breaks the shackle of stereotyped discourse into a modern context. In the modern context, it not only provides creative response to problems caused by modernity, but also echoes great contemporary achievements in China. From its unique standpoint, Confucianism is meant to discover cultural connotations pertained in great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reform and opening practice.

Keywords: Confucianism; theory; decontextualize; re-contextualize